

造成认知
一种特定的
境中新形成
跨文化相
动传统文化

教授)

作为他者的环境

——早期殖民者对澳大利亚环境的认知与利用*

费 晟

摘要 早期欧洲殖民者对澳大利亚环境的破坏与改造通常被归因为他们不适应并厌斥新环境,但新近的研究表明殖民者对澳大利亚环境的认知其实是复杂多样的。囚犯、自由定居者、官员与专业人士面对类似的自然环境,却具有不同的理解以及相关的实践反应。各人际遇、知识结构以及职业习惯都影响其对新生存环境的态度和利用。对于新移民而言,不仅是原住民,陌生的殖民地原生环境也影响了他们对“他者”的想象,这反过来塑造了其环境改造活动。

1850年代是澳大利亚殖民地历史的分水岭。从经济上看,继1830年代牧羊业大扩张之后,此时爆发的淘金热促使澳大利亚经济体完全融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从政治上看,英帝国对澳大利亚的统治随着1859年昆士兰殖民地的确立而完全巩固。从社会上看,自由移民的涌入改变了早期澳大利亚殖民地作为囚犯流放地的身份,所谓“公民殖民地”或“自治殖民地”的新时代初具气象。^①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资源边疆的扩张,

* 本文的写作要特别感谢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欧阳迪平女士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环境与社会学院 Carmen Muir 博士在资料搜集方面提供的无私帮助。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澳大利亚环境保护活动的起源与发展研究(1863—1983)”(16CSS010)的阶段性成果。

① 《牛津澳大利亚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第二卷的起止年代就是1770—1860年,这一时间段通常被视为澳洲殖民地的早期时代。澳洲学者通常用“自由主义时代”或者“进步时代”来形容1850年代之后的澳洲殖民地社会,国内学者措辞虽有不同,但意涵亦无明显差异。参见: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三章;斯图亚特·麦金泰尔:《澳大利亚史》,世界图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五章;张天:《澳洲史》,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四章第二节;王宇博:《澳大利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二章。

殖民者对澳大利亚腹地多样化环境的认知也日益深入,澳大利亚不再只是探险家报告中遥远陌生的异域。

纵观殖民者在非欧洲土地上的拓殖与开发,不仅锻造出一种“新欧洲”社会,也前所未有地改造了本土生态体系。^①就澳大利亚环境史研究而言,促使其诞生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理解欧洲移民与澳大利亚环境的相互影响。^②学者们普遍认为,欧洲殖民者在澳洲试图征服的“他者”绝不仅是土著人群,更是他们所处的整个自然环境。^③

一 “无情”还是“钟情”:关于早期殖民者对澳大利亚环境认知的争议

在探索、适应和改造澳大利亚自然环境的实践中,殖民者的环境观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一个常见的论断是,早期殖民者不仅不适应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甚至是无情厌憎,因此破坏和改造起来毫不留情。早在1930年,澳大利亚最著名的第一代本土历史学家汉考克(W. Hancock)就指出入侵者们憎恨树木,而几十年后澳大利亚第一代环境史学家莱尼斯(W. Lines)、鲍威尔(J. Powell)以及博尔顿(G. Bolton)等也普遍认为“澳大利亚拓殖先驱对这块土地毫无感情,仅仅把它当成财富加以压榨。即便到1890年代部分殖民者开始批评这种态度时,他们也仅是关注浪费问题,对于自然、本土生活方式及传统景观的损毁毫

① 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贾瑞德·戴蒙德的《枪炮、细菌与钢铁》等书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与启示。

② 具体的研究可参见杰弗里·博尔顿的《破坏与破坏者:澳大利亚环境史》,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Derek Whitelock, *Conquest to Conservation: History of Human Impact on the South Australian Environment* (1985), 以英帝国史的全球性视角考察相关问题的代表作参见 Thomas Dunlap, *Nature and the English Diaspora: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William Lines, *Taming the Great South Land: A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Nature in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Tim Flannery, *The Future Eaters: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Lands and People*, Grove Press, 2002.

懊悔之情。”^①

不过根据蒂姆·邦尼哈蒂 (Tim Bonyhady) 的新近考证, 历史的真相与此大相径庭。2000 年他在《殖民的土地》中明确提出, 以对桉树这种澳洲特产树种的态度为例, 许多早期殖民者是欣赏其特性的, 因为它可能生长得粗壮挺拔, 此外澳大利亚温带谷地生长的欧洲罕见的高大桉树林更是惊艳。“殖民者对满足其口味的特定区域甚至情深意浓, 赞其风景如画, 让人如痴如醉……他们也一直努力希望保全它们。”^② 作为一名法制史教授, 邦尼哈蒂发现早在 1788 年 4 月最早的殖民地法令中就有要求保护香蕉树的条款, 而到 1803 年之后所有的重要法令都有自然资源保护的意识。更重要的是, 殖民地民间舆论也一直出于审美需要而要求保护自然景观, 尤其是艺术家们不遗余力地发掘澳洲自然之美丽。^③ 此书甫经问世便引发了学界和大众的轰动, 三年之中两次重印。

邦尼哈蒂的新论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 然而前人的结论亦言之有据。澳大利亚殖民者究竟如何理解并改造当地环境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逻辑尚未充分确立的早期殖民地社会, 拓殖者们究竟如何认知和利用陌生的澳洲自然环境, 恐怕还需从这里多变的具体自然条件以及殖民者的具体生存环境中加以理解。“这个新殖民地是海上探险、贸易和刑法学的产物”。^④ 囚犯群体并不代表殖民地社会的全部特色。对此, 伊丽莎白·韦碧 (Elizabeth Webby) 以及史蒂芬·马丁 (Stephen Martin) 的史料整理研究给予了有益提示, 他们不约而同将早期殖民者留下的历史记录根据记录者职业及其关注的重点对象加以分类, 发现个

① 汉考克在 1930 年完成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一书影响深远, 被普遍认为是澳大利亚本土职业历史学家完成的第一部以澳大利亚本身历史进程为叙事线索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 鲍威尔更愿意将自己归类为“历史地理学家”而不是环境史学家, 但他在系列案例研究中详尽描述了澳大利亚东南部景观如何遭受欧洲移民的持续破坏, 从而为博尔顿全国性视角的研究补充了大量地方性经验。其代表性的论述可参见 J. M. Powell and M. Williams eds., *Australian Space, Australian Time: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② Tim Bonyhady, *The Colonial Earth*,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5.

③ Ibid., p. 9.

④ 斯图亚特·麦金泰尔:《澳大利亚史》, 第 27 页。

人背景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殖民者对生活及环境的感受。^① 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期,不断扩大的殖民区还意味着他们会不断遭遇新环境的挑战。

在补充发掘环境史相关材料的基础上,本文将剖析不同人群的环境观念,以此理解邦尼海蒂与前辈学者意见分歧的原因,同时也揭示在英帝国进行全球殖民扩张的大背景下,殖民者对作为他者的自然环境可能进行复杂的社会构建,而这不仅可能创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人地关系,甚至影响英帝国殖民统治方式的变化。

二 囚犯:煎熬中的憧憬

1788 年 1 月英国第一舰队在澳大利亚东南部创立了第一块殖民地新南威尔士。^② 从此时起至 1836 年东南部殖民地开始局部废除流放制度时,澳洲主要殖民地累计接受了超过 10 万名流放犯。^③

可惜在存续至今的史料中,来自囚犯的直接记录零散而稀少,主要是一些私信。在有限的材料中,普遍可以发现囚犯对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澳大利亚一切事物都充满抱怨。如苏格兰作曲者托马斯·瓦特林(Thomas Watling)因伪造文书罪于 1792 年被流放澳大利亚。在 1793 年 5 月他感愤地说:“这个国家的面孔简直是欺骗性的,看起来什么都丰饶充裕,但本土产的东西没有一样能够支撑人类社会的存续。”^④

尽管英国政府对囚犯并无怜惜,但也希望拓殖者们能复建母国的生产生活。事实上,所有补给船都会运来各种物资,包括庄稼种子、秧苗、农耕工具以及各类欧洲禽畜。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囚犯中大部分都是城镇无

① Elizabeth Webby (ed.), *Colonial Voices: Letters, Diaries, Journalism and Other Accounts of Nineteenth-Century Australia*,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9; Stephen Martin, *A New Land: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Australia, 1788-1850*, Sydney: Allen & Unwin, 1993.

② 具体情况可参见罗伯特·休斯《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1787—1868》,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81—83 页。

③ 张天:《澳洲史》,第 131 页。

④ Thomas Watling, “12 May 1793,” *Letters from an Exile at Botany Bay to His Aunt in Dunfermline, Giving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Settlement of New South Wales, With the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Inhabitants*, Penrith, 1794, p. 2.

产者，虽然罪行未必严重，但八成以上涉嫌惯偷，另还包括一些手工业者和政治犯，总之普遍不具备农作经验。^①可以想象，在有限补给的情况下囚犯们从零开始学习农耕，过程与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尤其还是在自然禀赋迥异的澳大利亚。1788年的开荒农业以彻底失败告终，整个殖民地陷入长达一年半的饥馑。菲利普总督在给伦敦的报告中叹息：“阁下，经验告诉我，让一帮子习惯了人生中充斥着恶习和怠惰的人变得勤劳有多么困难……对此无论是鼓励表扬还是批评惩罚都不管用。”^②

除了环境不适，囚犯们不是被委派给官员和自由移民做仆役便是直接受殖民当局指派充作苦役，工作时往往还要带上枷锁和脚镣。这种生存处境让他们乡愁倍增，更强化了对周遭环境的憎恶。1790年年底的一封囚犯家信写道：“上帝只知道我们的总督如何思考，或者只关心他给家里的汇报；但从我们这些人角度看，从上至下，没有一个人会从一开始就感到哪怕一丁点的满意。……我们听说家乡一些人可能犯了死罪，而他们可以选择被流放到这里来保命，结果他们宁可选择前者。”^③这种境况在40年后也没有多少好转，一个叫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的囚犯苦力曾被迫修建通往西部内陆的道路，他回忆道：“澳大利亚的天气太苛刻了，毫无仁慈……极度寒冷，让人总想再多加一条毯子……好把自己从冻僵的濒死状态下救回来。……树皮做的床单铺在床上，破旧的毯子盖在身上。枕头就是一段原木。我四肢都冻僵了，活动很困难，只能不断生火，一晚上都没法睡一个整觉。当我一次次从恐怖的、无情的、毁人的冷夜醒来时，就瞅着那崎岖的山岭覆盖着冰雪，而冰冷的劳动工具就盯着我的脸。我就这样熬啊，等星星退出天际，我哭了好多次，我抱怨倒霉的命运……”^④

毫不奇怪，囚犯亡命荒野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缺乏地理环境知识，殖民地甚至闹出令人哭笑不得的意外。1791年11月，20个男囚犯带一个孕妇出逃。一个礼拜之后大部分囚犯被捕回或因饥饿难耐而返回，后一批

① 罗伯特·休斯：《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1787—1868》，第185页。

② “Phillip to Grenville”，17 July 1790. H. R. A. I, 1, p. 195. 转引自 Manning Clark, *Select Documents in Australian History*,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55.

③ *Gazetteer*, 29 Dec. 1790. H. R. N. S. W., Vol. II, p. 758.

④ Thomas Cook, *Exile's Lamentations or a biographical sketch*. A1711, pp. 16–18. 新南威尔士州图书馆馆藏档案（Archive of the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以下简称“新州档案”。

人供说他们打算逃往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距离这里不到 100 英里，向北跨过河流即可抵达。^① 殖民地军官沃特金·坦奇（Watkin Tench）在记录了这段趣事时评论道：“（被捉回的人）说他们之所以逃走是因为受不了过度的劳动和严酷无情的待遇，他们宁愿选择丛林里蛮荒而不确定的生活方式，也不愿再回到这种被强迫劳动的悲惨生活中来。”^②

此言不虚，澳大利亚东南部由稀树草原、金合欢树丛及桉树林构成的荒野，尤其是殖民开发尚未波及的陌生腹地常常成为囚犯逃逸的目标。虽然那里意味着更艰难苛刻的生活环境甚至死亡，但也是自由的象征。比如 1802 年在菲利普港区（今墨尔本附近）服刑的英格兰石匠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就遁入了丛林，直到 1836 年才被殖民者重新发现。当时他已经完全融入了土著社会，30 余年未曾剃发刮须，身披袋鼠皮，手持木棍与盾牌，一度被造访者误认为是土著部落领袖。这个案例说明殖民者其实能够适应土著环境，甚至可以学习利用土著的技巧与经验。^③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出于乐观的个性还是随遇而安的心态，一些囚徒也明确表达出对殖民地自然环境的接受和欣赏。比如曾经抱怨环境的瓦特林其实也欣赏于澳大利亚的美景。他描述自己在海边迎风休息时的感觉说：“在这里，诗人可能发现无数的魅力四射的东西；再也没有比这里更能激发想象的地方了。这里有远离战火的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这里有天堂一样的风景，是托马森（Thomson）笔下的裸女摩希德拉（Musidora）秘密休息之所，阿卡迪亚的影子随现……凉风袭来，香气四溢。——这里不逊于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④ 瓦特林使用这样的比喻，一方面是渲染乡思之烈；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澳大利亚的大自然爱恨交织、欲罢不能的感情。

另一个囚犯银匠威廉·诺阿（William Noah）以质朴直白的语言同样表

① 沃特金·坦奇，《澳洲拓殖记》，刘秉仁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207、210 页。

② 同上书，第 207 页。

③ John Wedge, "On the country around Port Philipp,"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6, 1836, pp. 419-424.

④ Thomas Watling, "12 May 1793," *Letters from an exile at botany bay to his Aunt in Dunelm*, p. 7. 忒勒马科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意思是远离战争，其经历象征着游子最终回到家乡尽忠尽孝，而摩希德拉是源自英国作家詹姆斯·托马森 1727 年创作的诗歌《夏天》中的女性角色。诺阿描绘了一个青年无意中撞见美少女裸浴时欲火焚身又想竭力压抑的场景。

达了对环境的认可, 尽管他在旅程中就经历了九死一生。1798 年时, 他笔下自己的生活特色是吃袋鼠肉、打苍蝇、捉漂亮但不会学话的鸚鵡。他认为澳大利亚的自然令人感到刺激却不至于不安: “这里和英格兰有很多不同, 自然的一切事物看上去都奇怪, 月亮似乎就在头顶上, 夏季和冬季颠倒, 没有固定的天气, 一个小时之内会从阳光普照变成电闪雷鸣, 大雨瓢泼。令人很意外的是, 在英格兰生不出孩子的健康女人在这里居然有了家庭, 而且在这里我还没有看到过有畸形的孩子诞生。”^① 威廉敏锐地意识到澳洲日光更充裕、空气更清洁也更干爽, 远比气候阴郁且已始遭受工业污染的英国更有益于身心健康。

可以确信, 流放犯们在感受和描绘澳洲自然环境时更习惯于将其与自身的处境和心情联系。由于人的情绪时常变化, 因此留给后人的记录也可能出现矛盾之处。具有讽刺性的是逃亡丛林的囚犯, 居于荒野以劫掠旅客维生。结果在一般殖民者心目中, 人迹罕至的遥远荒野更加成为一种危险环境, 逃犯们本身成为令人不安的殖民地环境的一部分。

三 定居殖民者: 痛并快乐着

在一个移民殖民地, 定居的意思就是清理出一块土地, 然后开发并守护住它。^② 但前文已述, 殖民当局发现囚犯普遍缺乏农业经验, 这严重妨害殖民地的存续, 于是英国政府开始资助自由移民前往澳洲定居。高潮迭起的产业开发也吸引了自主移民, 他们与刑满释放的囚犯一起构成了殖民地早期的自由定居者, 至 1840 年代人数上已完全压倒了囚犯。^③

为了鼓励定居, 殖民当局会主动授予自由殖民者土地, 并配套生产工具、种子及禽畜, 而自由移民往往会圈占更多的土地。比如 1819 年麦夸里 (Macquarie) 总督收到一封恭敬的陈情: 一个自由移民被授予 80 英亩土

① Stephen Martin, *A New Land: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Australia, 1788 - 1850*, p. 112.

② Ibid., p. 53.

③ 1819 年澳大利亚人口中 75% 仍然是囚犯, 但是 1847 年, 新南威尔士囚犯仅占人口数的 3.2%, 在塔斯马尼亚也不过 25%。1831—1850 年, 澳洲吸引移民 25.5 万人, 自有移民高达 17.7 万人。参见张天《澳洲史》, 第 151—152 页。

地,但实际上却占下了 140 英亩,请求总督认可既成事实。^①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只是因为贪心,也是因为澳大利亚土壤肥力不足。澳洲土壤的含氮量普遍低于其他大陆,因此定居者圈占的土地看似广大,但易于耕作的并不多,如前述案例中 140 英亩土地可耕作的仅 40 亩。结果即便具备一定农耕经验的移民对澳洲环境也常常抱怨,比如“土壤种一次之后就荒芜和耗尽了。……如此炎热的环境,灰还特别大,而一到下雨天,牛群就经常是连膝盖都陷在泥坑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些牛棚有干草……粪便,要么是风干了以后你不留神就吸进一口,要么就被雨水冲走了。……这里的草(主要是白茅草)做屋顶建材不行,很难搞到干草,质量也不行”^②。与土著的冲突更加剧了他们对生存环境的紧张,特别是土著会放火毁掉种植的小麦。在植物湾地区,“起因是一些羊倌的羊被土著射杀了。随后冲突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土著觉得我们很凶残,于是在我们报复之前,很快干掉了我们的一位羊倌。这个事件要优先解决,防止土著劫掠,然后是防止恐慌情绪。……我毫不讳言,他们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了巨大的血肉代价,否则事情不会解决得那么好。但用火伤害我们是他们的能力”^③。

然而在反复积累经验以及驱赶屠杀土著之后,主要殖民地的社会生活日渐稳定,定居者对生存环境的审视也变得更加平和。1830 年代末出生的玛丽·肯尼迪(Mary Kenndy)回忆自己的童年说:“阿尔卑斯山太令人难忘了,有多少事物让我们感到享受啊,为此我愿意每周日都去教堂。我们穿行在凉爽的晨风里,鸟儿歌唱,昆虫争鸣。放学后我们就走进金合欢林群采集树胶,礼拜六就去溪流里搜集鹿角蕨、岩百……我们煮蛋,然后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在岩石上烤蛋糕。”^④这里的“阿尔卑斯山”是澳洲殖民者对大分水岭南部的称呼,后者从 19 世纪初就被认为堪比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可见殖民者对它的认可。

随着定居圈的扩大,殖民者对于澳洲环境复杂性的认识超越了大陆东

① Stephen Martin, *A New Land: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Australia, 1788 - 1850*, p. 54.

② George Caley, "A short account relative to the proceedings in New South Wales 1800 - 1803," *Banks Paper*, A - 79 - 1, pp. 206 - 207. 新州档案。

③ George Caley, *A short account relative to the proceedings in New South Wales 1800 - 1803*, pp. 202 - 219. 新州档案。

④ Stephen Martin, *A New Land: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Australia, 1788 - 1850*, introduction, p. VXIII.

南一隅。监管重刑犯的范迪门殖民地（今塔斯马尼亚岛）和印度洋畔的天鹅河殖民地（今西澳大利亚）就是典型。通常殖民者认为澳洲大陆气候干燥、缺少河流以及高大乔木，但塔斯马尼亚岛是个例外。1826年，定居者约翰·阿伯特（John Abbott）在移民宣传册中记叙自己的感受：“这个叫作范迪门的岛屿，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土壤肥沃……山峦起伏，让从海上远眺的人都印象深刻。这里乍看上去光秃秃的、了无生机，但凡进入被勘测过的内陆，美丽的乡村就跃入眼底，肥沃的平原无边无垠，生长着稀疏的树木。高低不一的山丘，植被丰茂，尤其是冬天和春天，都有大量牧场可用，值得用最丰富和华丽的辞藻来描绘。”^①而西澳大利亚腹地荒漠广布，难以驻扎，因此人们通常在密集高大的红桉树林边而非开阔地定居。盖大木屋、狩猎与户外徒步很快成为西澳生活的特色。1830年随丈夫抵达的伊丽莎白·肖恩（Elizabeth Shawn）在三个月内盖起了拥有三个房间的大木屋：“它像宫殿一样，非常舒服，所有一切看起来都堂堂正正，很满意，很开心……感谢上天，我们很高兴，对自己满意，对这里的一切都满意……就是热得不行，12月到1月时，热得人要抓狂。”^②殖民者适应新环境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袋鼠肉变得广受欢迎。伊丽莎白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肉类是必需的，除了牲畜，袋鼠也可以吃，人们都吃……当我们得到这种美味时，感觉和牛肉差不多，但是袋鼠有一种牛肉绝没有的野生的味道。它没有脂肪，却是我吃过的肉汁最丰美的动物。”^③在所谓更边远落后地区定居的殖民者绝非只有痛苦和坚忍，他们能自得其乐。

安逸的定居生活最大的标志是建立欧洲式的花园。当时殖民者有意在澳洲复制在母国广受欢迎的阿卡迪亚式田园风光。^④1829年，定居西澳的珍妮·科瑞（Jane Currie）记录了自己种植蔬果的经历。她感叹说：“继承了祖先英名的人们啊，尽管远离出生的地方，你和我都爱自己的林地及一切土地上的欢愉；你的母亲会如此吟唱，这里，天主就是国王，教堂尖顶

① John Abbot, *Van Diemen's Land—it's natural productions*, 1826, DLMS 238, pp. 2-3.

② Elizabeth Shawn, March 10, 1832, *Ms. Transcripts* 1829-1833, B164. 新州档案。

③ Elizabeth Shawn, January 21, 1832, *Ms. Transcripts* 1829-1833, B164. 新州档案。

④ 参见费晟《论19世纪上半叶“阿卡迪亚”自然观在澳洲的实践与衰落》，《亚太研究论丛》，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2010年12月。

的英国钟声鸣叫，令荒野也作响。”^①在此，一个新移民自由舒畅的心情跃然笔下。1830年代定居澳洲的英国记者威廉·霍维特（William Howitt）更记录道：“英国的农场、英国的花园、英国的牛群和马群、精心栽培的英国花朵和植物……英格兰在新的土地上复制出自己……在花园中，大树、灌木丛环绕着你，还有鲜花，那些东西本来只能生长在我们（英国）的暖房中。……你很难想象有这样一种丰裕和美好的景象。由此，人们不会诧异为什么有头脑的人会不远千里选择这块遥远的殖民地度过人生。”^②不过殖民地的新花园并非只有舶来物种，澳洲本地物种也可以被容纳进来，比如普遍受欢迎的金合欢灌木丛。伊丽莎白·肖恩还在信件中炫耀：“从去年7月到现在，我们这里植被不断……和英格兰一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野芹菜长得很好，不用培育就能吃。”^③需要注意，除了引入的欧洲物种，以野芹菜为代表的等本土植物也开始被吸纳利用了。

日益成为殖民地社会中坚力量的自由定居者对澳大利亚环境的认知与囚犯们多有不同，他们根据自己生活发展的需要以及欧洲田园审美传统审视澳洲的环境。他们对澳大利亚自然环境的认识和利用从陌生变得熟悉，其态度也从贬抑到溢美，所以容易给后人造成误解。这种转变不仅说明移民个体对“他者”环境的理解会发生变化，也意味着一种澳大利亚本土认同正在酝酿滋长。

四 殖民地官方人士：探险、科研与功利开发

随第一舰队抵达的押运官兵及其家属是殖民地最早的统治阶层。除此之外，由于创建澳大利亚殖民地过程中以博物学家班克斯（Joseph Banks）为代表的学者也发挥了积极影响。因此专业技术人员也成为殖民地社会决策倚重的力量。上述两类精英数量相对少，但话语权极大。

作为流放犯殖民地，英国当局为了保持社会秩序稳定而有意强化总督的独裁权，官方力量对社会活动的干预格外强劲，这在环境改造问题上也

^① Jane Currie, "Diary 1829 - 1832," *Curries Papers*, A2887, Vol. 2, p. 78. 新州档案。

^② William Howitt, *Land, Labour and Gold; or, two years in Victoria, with visit to Sydney and Van Diemen's Land*, London: Langman, 1855, p. 57.

^③ Elizabeth Shawn, January 21, 1832, *Ms. Transcripts 1829 - 1833*, B164. 新州档案。

有所表现。比如作为一种新兴的人造景观,殖民地城镇房屋一度完全由当局统一制定标准建造,为了省去制造砖瓦的成本,还要求建筑材料都用树皮和薄木片。^①

相比于维持秩序,对殖民当局来说更艰巨的任务是创建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因为远程补给并不可靠。于是“官员们只关心澳洲自然环境的一种特质,即是否具有经济开发的潜力”^②。当时各类文献中“自然产品”(natural product)成为常见词,代指澳洲原生环境中一切有利可图的要素。

在1850年之前官方始终把推广欧洲式的密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并不断派出探险队寻找理想的耕地。这样的土地要具备三个性质:肥沃的土壤、永久可靠的水源以及足够的木材供给。按这个标准,当时殖民地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是希望的田野。1803年,官方探险队在菲利普港湾附近尝试推行农耕,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只得撤入塔斯马尼亚岛。^③与此相仿,西澳大利亚的风蚀岩景观天下独绝,但在勘测员的眼里毫无意义。1841年4月,负责勘察珀斯腹地的菲利普·钱司(Philip Chauncy)写道:“这是一个对人畜完全无用的地方。我在你们可以想象的最恐怖的国家开始出色的勘测工作。沙子是纯白的,岩石也是如此,这大概是地球上最后形成的一块地方……石头像针一样竖立着,大概有3—4英尺高。满地都是白色,像下了雪一样,路很难走,地面好像被刷过了一样,没有草,但有很多山。”^④

值得注意的是,有计划的探险与勘测从一开始就沿海岸线及内陆两个维度分别推进,专业人士对澳洲未知环境的憧憬是这类活动的重要支撑。马修·弗林德斯(Matthew Flinders)在1800—1803年完成了环澳航行,他沿途搜寻适合扩大殖民的土地,但收获不容乐观。他在给班克斯的信中

① Bruce Davidson, "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Rural Landscape," in George Seddon and Mari Davis (eds.), *Man and Landscape in Australia: towards an Ecological Vision*,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76, p. 65.

② R. L. Heathcote, "Early European Perception of the Australian Landscape: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in George Seddon and Mari Davis (eds.), *Man and Landscape in Australia: towards an Ecological Vision*,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76, p. 42.

③ Don Garden, *Victoria: A History*, Melbourne: Nelson, 1984, pp. 11, 18.

④ Philip Chauncy, 27 April 1841, *Diary*, MSQ11, part 2. 新州档案。

说：“新荷兰^①和我们通常所预想的可能大不相同，南纬 18 度附近可能有大河的入口，……对于地理和自然史的总体兴趣，尤其是对英国国运的兴趣，似乎要求我们完全勘测这一地球上最后剩下的广袤陌生的区域。……在自然产品中，就已经发现的东西来看，本质上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的。”^②而在内陆方向，“根据欧洲的知识经验和北美、非洲的殖民实践，殖民者普遍认为澳大利亚境内应该存在一条大型的河流。……内陆探险的过程实际上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地理学家、探险家基于原有的经验和知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入探索澳大利亚内陆地貌气候，摆脱盲目与朦胧的判断，建立起对澳洲内陆地区全新的地理学解释的过程。”^③至 1840 年代，当局探寻澳大利亚内陆水体的努力达至高潮。著名探险家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urt）1844 年从南澳大利亚殖民地出发，携带 15 名随从及 200 只羊向西北部腹地挺进：“（因为河流都从内陆流过来）所有的迹象都让我相信，大陆内应有大量水体存在。殖民区外部的热带地区，如果是陆地，那可能会很肥沃，水路发达，可供航行。”但经过一年多的探索，他既没有发现大量水体，也没有找到优良的草场，只看到了“无边无垠的大平原占据了地平线，从西南向东北延伸，没有一点草和树木，都是大石头”^④。心灰意冷的斯图尔特撤回了南澳，他没有掌握澳洲季流河的规律。至此官方基本放弃了拓殖澳洲内陆的希望，同时整个殖民地社会也都强化了这样的认识——澳洲大陆大部分区域尤其是内陆环境都是荒漠，不堪利用。

不过，探险一旦有所收获，随后就是高强度的开发。比如早期殖民官员和探险家都注意到殖民地海豹种群的数量足以支撑皮毛与油脂产业，甚至认为海豹资源丰富，不会枯竭。捕杀海豹的活动在 19 世纪初就迅速展开，至 1830 年都是殖民地主要的经济来源。据估测仅在 1806—1810 年期间，澳大拉西亚（包括新西兰殖民地）捕杀了大约有 25 万头海豹，以至

① 欧洲殖民者与澳大利亚最早的称呼，因荷兰航海家最早抵近澳洲西部而得名。

② “Mathew Flinders to Banks,” 6 September 1800, *Banks Papers*, A83, pp. 59–60.

③ 乔瑜：《澳大利亚殖民时期“干旱说”的形成》，《学术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122 页。

④ 详细内容可参见 Charles Sturt, *Narrative of an expedition into central Australia, perform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during the years 1844, 5, and 6*, London: T. and W. Boone, 1848. Chapter 11. 该书由阿德莱德大学图书馆复制为电子书，访问网址为：<https://ebooks.adelaide.edu.au/s/sturt/charles/s93n/contents.html>，访问时间 2017 年 4 月 20 日。

于这个产业在 1830 年代后无以为继。^① 此外,木材也是重要的经济物资,然而澳洲大部分品种的桉树都不适用于造船和建房,因此寻找适合的林木资源也成为官方努力的方向。塔斯马尼亚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分布着澳洲大陆较为罕见的雪松,由此迅速遭遇掠夺性开发。1828 年时,塔斯马尼亚岛西北部沦为伐木基地。^② 30 年后该地原始森林即不复存在。

殖民地官方对自然价值的评判也会随具体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变化。1830 年代牧羊业大扩张之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勘测任务成为翻越大分水岭寻找牧区。新南威尔士总测量官托马斯·米切尔(Thomas Mitchell)对此贡献卓著,他规划了一系列向西南进发的道路,同时在土著向导约翰·派博(John Piper)的帮助下数次深入维多利亚殖民地进行勘探。^③ 1835 年春季他抵达维多利亚东北部时感慨:“我们赶着沉重的马车朝两个方向前进,除了蓬松的土壤,再没遇到什么妨碍前进的自然阻力;在回程的路上,平原上群芳绽放,山包上郁郁葱葱,早春的风儿吹浮(拂)在面庞。我要称它为‘澳大利亚的福地’(The Australian Felix),以此区别我向内陆探险时遇到的不毛之地,唉,我们在那里徘徊了如此之久却毫无收获。”^④ 1803 年被官方抱怨唾弃的维多利亚此时成为掌上明珠,因为此时“相对于其他任何一个殖民地,维多利亚易于进入的地区更广大……这里空气干净,轻快且似乎有弹性;从来不会太冷;冬天是温和的,没有雪,潮湿的小风凉飕飕的。许多地方太适合养羊了。”^⑤

部分精英也依据当时欧洲科学知识体系来认识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他们把这里的生物和地貌视为新颖的客观研究对象,试图参照既有标准加以分类,或者提出新的解释。不过“科学兴趣相对仅仅停留在那些有助于

① Don Garden,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Pacific: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lifornia: ABC-CLIO Inc., 2005, pp. 78-79.

② Stephen Martin, *A New Land: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Australia, 1788-1850*, introduction, XV.

③ 有关托马斯·米切尔的具体勘探事迹可参见《辞典》(*Australia National Dictionary of Biography*): <http://adb.anu.edu.au/biography/mitchell-sir-thomas-livingstone-2463>.

④ G. Bulter. Earp, *The Gold Colonies of Australia, and Gold Seeker's Manual*, London: G. Routledge, 1852, p. 191.

⑤ F. Lancelott, *Australia As It Is: Its Settlements, Farms, and Gold Fields*. Vol. 2. London: Colburn and Co., Publishers, 1852, pp. 53, 64-66.

解决资源确认和使用的实际问题。”^① 比如作为重要神职人员的地质学家瑞文瑞德·克拉克（Reverend Clarke）便是如此。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地质史专业，认为科学就是为了找到上帝造物的证据，于是他一方面尝试把澳大利亚大陆放置到全球地质学的分类框架里理解，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找到造物主给人类留下的有用矿物。^② 又如1800年起便受雇于班克斯的乔治·凯雷（George Caley）。他被指派掌管殖民地植物园后记录说：“殖民地往西很远是山脉，很少有人访问过。……我去采了悬崖上的岩石标本，立刻就检查矿物含量。……动物和植物王国里每一样东西似乎都是全新的。周围铁非常多，而一个康涅什人给我一块石头，里面含有铜矿。”^③

随着科研兴趣与功利开发日益紧密绑定，一些人造景观的公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当地植物园本来是为了准备向欧洲传送新奇植物的，但到1830年代之后成为用来培育外来植物以便向民间推广的基地。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Kew Gardens）成为整个帝国内物种培育的中转站，主要向殖民地输出有商业价值的植物。^④

无论是官员、探险家还是所谓的科学家，他们的职业使命令其尝试在更功利也相对更客观的标准上评析殖民地的自然资源。然而他们都具有各自的审美原则和偏好，因此留下的记录也可能前后不一。比如曾经抱怨澳洲荒凉不毛的弗林德斯在1795年感慨：“这是我们的幸运，在沐浴甘霖后看到山岭里反射太阳的光芒。景色是多么壮观啊。现在，我们不能抱怨谴责这里贫瘠，一个贫瘠之地怎能造出如此美丽的景观？”^⑤

五 殖民者对澳大利亚“他者”环境认知差异之解析

在欧洲列强向广袤的海外地区殖民扩张过程中，殖民者遭遇不同的文

① R. L. Heathcote, “Early European Perception of the Australian Landscape: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in George Seddon and Mari Davis (eds.), *Man and Landscape in Australia: towards an Ecological Vision*, p. 42.

② Reverend Clarke, May 31, 1844. *Clarke Papers*, MSS139/42. 新州档案。

③ “Caley to Banks,” 11 March 1814, *Banks Paper*, MSQ 158. 新州档案。

④ R. L. Heathcote, “Early European Perception of the Australian Landscape: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in George Seddon and Mari Davis (eds.), *Man and Landscape in Australia: towards an Ecological Vision*, p. 42.

⑤ Matthew Flinders, *Observations on the Coasts of Van Diemen's Land*, London: John Nichols, 1801, p. 4.

明及陌生环境是不可避免的。在诸多有别于英国乃至欧洲的殖民地中，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毫无疑问是最具特色的。作为殖民者需要适应或改造的对象或“他者”，澳大利亚殖民地的自然环境给不同人群留下的印象也不尽相同。一方面需要认识到，这片面积达到 76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本身拥有多变的地貌与生态体系，这对殖民者的视觉及其既有环境观念既是惊奇也是挑战。不同殖民区的自然禀赋差异可能让即便背景相似的人群意见相左。比如很少看到勘测官对塔斯马尼亚的气候和植被不满。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早期殖民者社会身份和处境的差异也深深影响他们的环境认知。尽管所有移民都会感觉澳大利亚的生态环境与众不同，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现象在囚犯殖民者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而“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在定居殖民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对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以及肩负维持殖民地发展使命的官方背景人士来说，依据相对更丰富的专业知识素养以及功利性的标准理解殖民地环境亦不出奇。当然无论如何，都应承认个体对自然环境的认识的多变性。所有殖民者都可能根据具体的场景、既有的知识经验以及固有的审美情趣去理解和接触自然，不可一概而论。这就解释了本文开头所介绍的澳大利亚环境史学家对早期殖民者自然观分析的争论：矛盾双方的判断都不算错误，但都只抓住了当年殖民者与自然环境复杂互动的一个侧面。

不仅如此，关于早期殖民者认识和利用澳大利亚自然环境的研究还揭示出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客观存在的物理环境固然直接影响殖民者改造自然的努力，但是作为社会文化而构建出来的环境观同样深深影响殖民者对自然环境的感情与实践。一方面，这种构建过程不仅受到时代的影响，也常常建立在局部观察或片面体验之上，而所有的环境观都要在实践中接受考验并修正。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早期殖民者无论身份高低，都投身于建设母国的农耕社会，但最终大获成功的还是畜牧业生态经济体。此外，不管殖民者是否真正欣赏澳大利亚的自然景观，他们如果要生存，就不可避免地要接纳当地的生态体系，或者更准确地来说，是被当地的生态体系所接纳。在这种接触中，丛林中的嬉戏、野餐、徒步以及捕猎成为欧洲人在澳大利亚的重要生活经验和文化特色，极端的案例包括养成吃袋鼠的习惯以及几乎变成土著的逃犯。日后这也成为澳大利亚新欧洲社会文化的基础。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建立了一个跨越全球的复杂的自然环境交流网络。最晚融入这个网络的澳大利亚殖民地为它贡献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要素，也为帝国政府既定殖民政策的变化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影响。1844年，移民自苏格兰的记者大卫·伯恩（David Burn）访问了新南威尔士沿海的诺福克岛，这里长期关押着一些重刑犯。在参观官方设立的花园后他写道：“这是一个幽静宁谧的地点，一个或许让热爱诗歌的人想找个情人的地方。无花果、葡萄、桃子、番石榴、香蕉、杏子、草莓、菠萝、咖啡豆，应有尽有。……凝视这地球上令人陶醉的通往伊甸园的大道，人们几乎会忘掉这里到处都是人渣。啊，褻渎这样迷人的景致实在是太令人痛苦了……怎能把如此值得大肆宣扬其美丽的地方变成一个臭名昭著的、不值得羡慕的罪恶之地？”^①在1840年代英帝国内此起彼伏要求废除流放犯制度的运动中，伯恩是积极的参与者及推手，但他居然是以保持澳大利亚环境之美为理由摇旗呐喊。想必此时此刻，对大部分殖民者来说，澳大利亚的环境已经从令人费解的“他者”逐步变成殖民者心中珍贵的家园了。

（费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① David Burn, Dec. 26 1844, *Norfolk Islands Diary*, B190/2, p. 214. 新州档案。